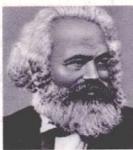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文明



Traversing the Historical Time-Space of the Capital:

The Critique of Modernity Base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 Inquiry into
a Major Approach

Subject Towards Practical Wisdom: A New Approach to Practical Philosophy Traversing the Historical Time-Space of the Capital The Critique of

the Capital The Critique of

“否定性辩证法”视域中的 “女性”主体性重构

Reconstruction of Female Subjectivity in the Horizon of Negative Dialectics

李 昀 ◎著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文明

“否定性辩证法”视域中的 “女性”主体性重构

Reconstruction of Female Subjectivity in
the Horizon of Negative Dialectics

李 昶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否定性辩证法”视域中的“女性”主体性重构 / 李昀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9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文明)
ISBN 978-7-5097-3746-0

I. ①否… II. ①李… III. ①西方哲学 - 研究
IV. ①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0441 号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文明

“否定性辩证法”视域中的“女性”主体性重构

著 者 / 李 昀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责 任 部 门 / 人 文 分 社 (010) 59367215

责 任 编 辑 / 王 琛 场

电 子 信 箱 / renwen@ ssap. cn

责 任 校 对 / 秦 晶

项 目 统 筹 / 宋 月 华 范 迎

责 任 印 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 者 服 务 / 读 者 服 务 中 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8.75

版 次 / 2012 年 9 月 第 1 版

字 数 / 274 千 字

印 次 / 2012 年 9 月 第 1 次 印 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746 - 0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伟大的时代要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实践相结合

(总序)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这既是在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如果说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列强用枪炮使中华民族第一次直面他们所输出的“文明”——一种扭曲的和以野蛮的形式表现出的现代文明的话，那么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则是中国人自觉地进行自己的现代化运动的尝试。这些尝试不论涉及的是新的物质文明生产方式还是社会制度层面上的变革，都先后以失败告终。在深重的历史灾难和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人作为民族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觉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文化层面上为中国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人民才真正地开始自己气势磅礴、创造历史的现代化进程。马克思主义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指导思想，而且成为主导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文化基础的核心和理论支柱。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思想的选择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由此开创了中华民族迅猛地迈向现代文明的崭新历史时代。中国共产党



2 “否定性辩证法”视域中的“女性”主体性重构

人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和建设，应该从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高度来理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结合起来的历史，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所开创的现代化的事业的结合不仅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不断地走向辉煌，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上不断地得到新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走向一个又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现代化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理论成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解决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不同历史阶段现实问题中凝结而成的思想精华。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相结合，并成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指导思想和文化核心，既是历史的机遇，又是时代的必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只是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机遇来说的。而从时代的必然性来看，当资本主义的文明以血与火、枪和炮的形式与中华民族遭遇的时候，中国人民一方面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在物质文明方面的落后，产生了对现代物质文明的向往；另一方面又对这种以血与火、枪和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制度和文化产生了强烈的感情上的反抗和深刻的思想上的反思。这种以血与火、枪和炮的形式表现出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就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现代文明吗？有没有另一种不同的现代文明形式呢？从一定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与其说是新旧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论战，不如说是对新的中国式的现代文明的寻思——对一种既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文明形式，又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的全新的文明形式的思考。五四运动时期所产生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主义，从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角度来考察，不正是人们对新的现代文明形态的思考和理论诉求吗？而马克思主义从它产生的一开始就是一种对当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和反思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不仅触动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对它的制度和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而且勾画了一个超越既有的所谓“自由”、“平等”的社会制度

安排的，以追求“人类解放”为目标的崭新文明形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的批判不是什么后现代主义的，而是要解答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致命性问题，致力于探讨一种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自由王国”。马克思在理论上所探索的东西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上所追求的东西。由此，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必然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代化的结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运动相结合不仅使中国的现代化不断地迈上一个又一个新的历史台阶，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一次又一次的新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等。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不同，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所为之奋斗的历史目标都是一致的，这就是建设一个富强文明的新中国。这是一个崭新的东方文明国家，是一种新的现代文明形式。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建设这样的新的文明形式，就是要努力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得到实现。

马克思主义从产生的一开始就探讨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文明形式——一种超越既有的形式主义的自由、平等和实现人类解放的“自由王国”。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中国的革命和实践也是要实行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崭新的现代文明形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既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的必然要求。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对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反思，离不开对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的深刻思考。离开了对现代文明的深入思考，离开了对中国现代化实践活动的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就成为脱离实践基础的空中楼阁，成为无根基的形而上学的玄思。或者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在这里，我们的语言“放假了”。反之，如果我们的现代化建设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那么就有可能使我们的现代化运动偏离从物的奴役和人对人的奴役中摆脱出来的“人类解放”这一现代性的主题，



滑入一种“野蛮”的现代性。由此，我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而在中国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运动的伟大实践。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不断深化的现代化运动结合起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才能真正地结出累累硕果；同样，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才能避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所走过的曲折老路。这就是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的根本立意，也是我们编辑和出版这套丛书的基本思想。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批判的哲学。因为马克思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阐明自己的本体论、辩证法、历史观和认识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学者甚至直接把马克思主义贴上“批判理论”的标签。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不仅仅是一种批判的哲学。马克思强调，他的理论工作就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和建设“新世界”。因此，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能，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批判的哲学，又是建设的哲学；既是革命的理论，又是建设的理论。马克思就是在批判资本主义文明形式的基础上致力于从理论上探讨建设“自由王国”的可能性和途径的。如果落实到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来说，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既要有批判，也要有建设。从批判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不断地反思迄今为止的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矛盾、挫折和教训，批判一切反文明、反文化和反人类的丑恶现象，深入思考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自我矛盾，特别是受资本主义现代化影响而出现的种种异化现象，探讨这些问题、矛盾产生的根源和解决的途径。从建设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积极地思考建设新形式的现代文明的可能性和途径，探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途径和方法，努力避免社会建设过程中出现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实际上的新奴役结局，努力以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新的文明价值矫正我们实践中的偏差，把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目标的“自由王国”的理想和现代化的建设实践结合起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健康发展，为推动人类文明的

进步，为当代世界现代文明的发展作出开创性的贡献。

近年来，中共中央一再提出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要求，并把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项战略任务，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新局面的战略高度来阐述这种要求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的重要意义。而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其中的一项重要的任务。本丛书的主旨就是要为这个建设工程贡献自己的力量。它立足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向度，坚持从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以及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中汲取营养，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并力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为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作出贡献。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需要马克思主义提供精神上的资源和价值上的引导，而马克思主义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创新。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和建设的传统。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而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也必定能够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发展作出贡献，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认为，实现这一结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肩负的时代使命。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

摘 要

把“否定性辩证法”引入对女性主体性的探讨是一种风险，也是解决女性主体性和代理权的重构问题的机遇。在牢记阿多诺建构的个体主体性、集体主体性和客观世界间的三星集结的同时，把阿多诺和后女性主义的理论进行缝合，既可以避免陷入同一性的桎梏，又可以避免“延异”中立的游戏，从而把女性特质的书写引入社会政治领域。

既然是重构，就离不开解构。阿多诺和后女性主义解构了同一性，包括同一性产生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和同一性的外化（自由—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建构的统一的女性意识和姊妹团体）。阿多诺认为，由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决定的同一性是“启蒙”时代最大的反启蒙，带来了对自然和人的双重奴役。在这种语境下，后女性主义开始反思“生产”概念对自然和人（尤其是女人）的压抑。后女性主义者发现生产关系的变革并不能改变女人的命运。于是他们开始关注被排斥在（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之外的女人所留存的特殊性，开始关注再生产。以克里斯蒂娃为例，她直面马克思文本中关于劳动和价值的探讨，提出了超越价值和交换的主张。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相结合，她探讨了一种不能被简约为价值的（再）生产，从马克思所说的杜会经济领域的商品生产和交换转移到文化领域的文本生产和意义交换。在她的文本理论中，她张扬前俄狄浦斯的母性的力量，把过去用作对现在和未

来的中介。

克里斯蒂娃认为，这是一种无须指涉产品的生产理论，并且认定是马克思的文本本身预示了建立这种文本生产理论的可能性。她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看到了一个另类的场景。它超越了产品逻辑，超越了价值和流通逻辑。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克里斯蒂娃抓住马克思所说的所有生产最终都是人力的耗费的论述，捕捉到一种“不具意义的”生产。它具有改造力量，同时又总是先于任何产品或交流性语言。和阿多诺一样，她憎恶纯粹为了交流的、共享的意义。在这种生产不代表任何价值或不具有任何意义的文本生产中，她关注生产过程中的异质性，以及身体和耗费之间的关系，探讨由此产生的过程中的主体。

在拆解同一性之后，克里斯蒂娃开始关联差异。和阿多诺一样，她对黑格尔理论中的“否定性”这一概念有着浓厚的兴趣。不同的是，阿多诺的异质性来自被主体经验的客体，而克里斯蒂娃则用“否定性”描述各种贯穿主体的心理—肉体的干扰性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孩子对母性身体的前俄狄浦斯体验。这种体验不仅是孩子自我构形的基础，而且潜伏在主体的发展过程中。它的爆发意味着对父性法则的干扰和破坏，并且会激发过程中的主体对社会象征契约的僭越，生产女性特质的“书写”。

另一方面，克里斯蒂娃认定，只有给差异的狂欢设置界限，才能让它构成“革命性”力量。重返母性身体的欲望威胁着男性特质的主体，但是语言法则的干涉却会阻止他堕入完全的毁灭或者“胡言乱语”。为了给母性身体命名，作家必须使自己与充满吸引力的母亲保持距离。因此，书写是一个悖论，既需要作者占据母亲的位置，同时又要与她保持距离，不能完全消解自我变成母亲。克里斯蒂娃试图以一种能产的沉默走出“女人”沉默的僵局。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恰当地关联母性身体和父性法则之间的关系。单方面强调母性身体会让身体的否定性陷入无止境的游戏，无法进入社会批判；而高估法则的同一性则会彻底扼杀身体的异质性。在这一点上，克里斯蒂娃捕捉到了“否定性辩证法”的精髓，把母性身体和父性法则关联为动态的相互中介关系。

这使得克里斯蒂娃不同于德里达和巴特勒，她既设置了法则的秩序又设置了颠覆法则的秩序。主体只有在法则、身份的设置和颠覆中才可能走向社会政治，而不是陷入理论的玄思，或者行动的无能。一方面，克里斯蒂娃在父性的社会文化的根基处保留了一种否定性，干扰着男根文化的同质性；另一方面，她认为，既然同一性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只有设置它的界限才能僭越它。和阿多诺一样，克里斯蒂娃也认为同一性是无法被完全否定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尚处在一种男根文化中，更是因为思维预设了同一性，行动也需要主体性。言说母性的身体是一种悖论，但是我们却不得不去直面、言说这个异质性的场所。书写因此成为一种同一性和差异之间的碰撞。这种碰撞始终会带来现有象征秩序的颠覆与重构。所以，就主体性的重构而言，必须承认主体内部的“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处于相互中介的过程中，而不是鼓吹缺乏任何分离或规约的想象。

后女性主义也必须直面女人的言说和主体性的问题。面对着“女人”与言说或主体性之间的悖论，在反本质主义的倾向中，后女性主义模糊了形而上学中的男/女、内/外的对立，打破了西方有关身体的常识和哲学设定，主张超越严格的男性/女性的界限，渴望创造一个宽容的社会环境，让女人的言说得以交流，能够被理解。而且，在突破有关母性的传统话语的基础上，后女性主义关联了一种女儿—母亲之间的同性恋关系，认为虽然对于女人而言，重返母亲带有比男性更多的风险，但是一旦这种冒险成功，由于她与母亲更私密的关系，女人的书写将更具颠覆性。在这层意义上，在缺乏个体心理空间的后现代景观中，只有女人才真正占据着激进的颠覆场所。她与象征游戏，用自身的差异颠覆象征法则。在游戏的同时，象征强加的规约又让这种差异性得以言说。在这种游戏中建立的女性主体性因此成为过程中的主体。

解决了艺术中的代理权后，后女性主义还有一个裂隙需要弥合，即从文本政治到社会政治的跨越。后女性主义探讨“个体性”或“私密性”正是为了走向社会政治。不过这种过渡需要引入阿多诺对艺术的内容和形式、艺术与社会的关系的论述，帮助女性特质的“书写”进

4 “否定性辩证法”视域中的“女性”主体性重构

入社会政治领域。相对于克里斯蒂娃理论中艺术的私密性而言，阿多诺直接把艺术置于社会领域，强调艺术的认知功能。他们的理论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就克里斯蒂娃而言，她关注个体主体性，她对先锋派艺术的分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对社会的批判，却恰恰补充了阿多诺所渴望的三星集结中的个体主体性的部分；就阿多诺而言，他强调艺术作品的社会功能，虽然不是聚焦在个体审美者的内在差异上，但是由于艺术作品与社会的关系，艺术作品直接成为社会的批判者，这有助于把克里斯蒂娃的理论引入社会政治领域。在此语境中，后女性主义讨论差异恰恰是为了把女性特质的因素引入主体性的重构，在这种重构中为处于危机中的西方主体疗伤。

关键词：否定性辩证法 同一性 差异 母性 女性主体性 代理权 后女性主义



导言 建构对话的桥梁 1

上篇 拆解同一性

第一章 突破同一性逻辑 19

- | | |
|---------------------|----|
| 第一节 破除主体性的神话 | 22 |
| 第二节 捍卫必要的主体性 | 41 |
| 第三节 有关主体性的关键词 | 57 |

第二章 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 73

- | | |
|-------------------|----|
| 第一节 批判生产 | 75 |
| 第二节 超越价值和交换 | 89 |

中篇 天联差异

第三章 女人与差异 115

- | | |
|-----------------|-----|
| 第一节 有声的沉默 | 116 |
| 第二节 母亲的中介 | 132 |

第四章 差异与文本实践 149

- | | |
|---------------------|-----|
| 第一节 诗性的意指实践 | 150 |
| 第二节 母性身体与父性法则 | 165 |

下篇

重构主体性

| | |
|--------------------|------------|
| 第五章 主体性的辩证法 | 183 |
| 第一节 差异无尽的游荡 | 184 |
| 第二节 同一性变换的面孔 | 207 |
| 第六章 代理权的辩证法 | 222 |
| 第一节 女人的言说与主体性重构 | 223 |
| 第二节 女人的言说与社会 | 239 |
| 结语 否定性的政治 | 254 |
| 参考文献 | 269 |

导言 建构对话的桥梁

把“否定性辩证法”引入女性主体性重构，这注定是一种悖论。原因有三：其一，阿多诺本人并不特别关心“女人”的问题，他和霍克海默在分析《奥德赛》时所关心的，只是落入“理性的狡黠”的奥德修斯的自我确认，而不是以歌声取悦和诱惑他的塞壬。后者的出现，只是为了发生那场与奥德修斯既成功又不成功的遭遇，帮助他完成自我发展的航程。甚至在诊断出资产阶级的父性法则（即理性）已经病入膏肓时，阿多诺所开的药方也不是母性的权威。其二，“女性主体性”的提法本身就是一种悖反。在当代哲学和文化批判中，“女人”隐喻着异质性（heterogeneity），而作为布尔乔亚思维的产物，“主体性”一词的词源意义则重在强调理性和同一性（identity），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难以消除的张力。但是，为了改变以女性为代表的个体在资本主义和其他父权社会中的不自由状态，以及女性特质的（feminine）因素在哲学中的命运，理论家又不得不以男性特质（masculine）之词去命名那不可言说的女性特质之物。这是一种辛酸的拯救。其三，“重构”一词预设着建构和解构。在这一过程中，主体性是否在发挥作用？而且，建构—解构—重构—解构，无休无止，意味着一个永远未完成的过程，一种“过程中的主体”（subject in process/on trial），这个主体过程对于当代政治有何帮助？这也是一个无法一言以蔽之的问题。

不过除此之外，“否定性辩证法”和后女性主义之间确实有许多相通之处，构成了把它们相提并论的基础：两者对重读黑格尔的“否定性”（negativity）概念有着同样浓厚的兴趣，热衷于为处于危机中的西方主体性寻找新的出路。这种出路是一种糅合了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的批判思维，并且，这种乌托邦被寄托在艺术中。“否定性辩证法”的目的、方法和范畴允许甚至要求女性主义的增补。而女性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也不自觉地吸收了“否定性辩证法”的养分。在面临新的困境时，我们需要把阿多诺的理论和女性主义结合起来。阿多诺的理论关注经验的美学—感性的维度，捍卫快乐和感官的满足，强调一种唯物主义的身体需求和潜能，这些都足以打开和性别政治之间的对话。就社会学而言，马克思主义一直强调人类的身体对个体生命的重要性、改善两性关系的必要性，以及家庭在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谴责父权制家庭对母亲和儿童的压抑，及其产生的极权主义个性。就哲学而言，虽然阿多诺关心的主要还是“男性”的欲望和自我确认，但是他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对自然的关怀，对总体化的社会中（男性特质的）主体的解构，对非同一性因素的张扬，都构成了他和后女性主义之间的默契。

当然，阿多诺的赎救和后女性主义的解决方法并不相同。总体而言，阿多诺更相信一种正确的理性的力量。他称之为“否定性辩证法”。它考察的是经验的结构，或经验与主体反思之间的关系，主张正确地认识经验的结构，否则哲学就会丧失理性地表达自身的能力。对于阿多诺而言，经验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最理想的状态是，主体由于遭遇客体或现实的某一方面而受到影响或发生变化。因此，经验的结构是相互的、改造的或批判性的。无论这种理想状态能否达到，阿多诺始终认为主体应该拥有“经概念中介的、完全的、不可还原的经验”^①。借助这种非意识形态的经验结构，阿多诺竭力反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正确的理性形式——“工具理性”。它是资本主义等价交换

^①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 B. Ashton,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3, p. 13/12 (本论文中，《否定性辩证法》的汉译基本参照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的张峰译本——《否定的辩证法》。文中引用如无特殊声明，则用“/”标明英译本和汉译本的页码，前为英译本页码，后为汉译本页码)。

原则的产物，把人类生活的质性特征还原为量性现实的碎片，把经验简约为主体操纵客体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主体被“物化”变形，开始通过一个由量化或标准化法则统治的社会感知自己的活动。思维变成了计算，主体失去了批判力，人类的活动只剩下对一系列事件——其眼中既定的法则——可能的后果的精确计算。主体不复为此过程的主人，堕落为奴隶。结果是，人类只能认识自己创造的客体，而无法思考外于思维的非理性的物性必然。阿多诺认为，要打破这种桎梏，就需要把主体引入与特殊性的关系中，真正把主体放入对特殊性的经验中，承认主体的经验是一个主体—客体互惠的过程。

该过程是一种由同一性和非同一性的因素相互中介的“力场”，由集体主体性、个体主体性和客体的抵抗力之间相互纠缠的和平“星丛”。阿多诺用“中介”这一术语来描述经验的结构。它是一种主体和客体相互决定的关系，揭示了意义是如何产生在主体—客体不同一却又相互作用的关系中的。中介不是联系两个各具意义的环节——主体和客体，而是建构主体和客体。由于中介，主体—客体相互建构，又因这种建构而相互独立。为了被思考，两者相互需要。对于阿多诺而言，中介的主要命题有三：其一，有意义的经验是主体—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二，客体不只是特定主体的概念规定，它是非同一的；其三，客体部分地由主体决定，因为它借助意识被觉察。^①

“力场”是一种既吸引又排斥的相互联系的作用，它构成各种复杂现象动态的、相互转换的结构。而“星丛”是阿多诺借自本雅明的天文学术语，指并列而非整合的一系列变化着的因素，这些变化着的因素抵抗被化约为公分母、基本内核或本源的第一性原则。在考察文化和社会现象时，阿多诺经常使用这两个隐喻，以把握主体—客体、特殊—普遍、历史—自然之间的微妙关系。他拒绝赋予“力场”或“星丛”中的某一个因素高于另一个的特权，并因此关联了一种对流变的现实既建构又解构的“否定性辩证法”，一方面竭力避免陷入相对主义的混乱，另一方面又积极挑战一贯凌驾于辩证的过程之上的综合环节：“世界的

^① Brian O'Connor, *Adorno's Negative Dialectics*, London: The MIT Press, 2004, p. 48.